

自然主义的政治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研究

田道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自然主义的政治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研究

田道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主义的政治：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研究 / 田道敏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203-0121-3

I. ①自… II. ①田… III. ①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 384-前 322)-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B502.233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090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25
插 页 2
字 数 181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河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资助成果

目 录

导 论	(1)
一 研究的问题及其意义	(1)
二 研究现状述评	(5)
三 研究目的、方法与难点	(11)
四 研究的思路、内容与结构	(14)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影响因素	(30)
第一节 雅典的政治环境	(31)
第二节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思想	(34)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伦理学	(43)
第二章 城邦的由来与目的论原则	(52)
第一节 城邦的自然存在	(54)
第二节 凯耶特的解释	(58)
第三节 米勒的解释	(66)
第四节 目的论原则的解释	(71)
第三章 政治动物与完善主义原则	(81)
第一节 “人类本性上是政治动物”及其论证	(81)
第二节 凯耶特的解释	(83)
第三节 米勒的解释	(88)
第四节 完善主义原则的解释	(95)

第四章 城邦的优先性与共同体原则	(114)
第一节 城邦之于个人的优先性	(114)
第二节 凯耶特的解释	(116)
第三节 米勒的解释	(121)
第四节 共同体原则的解释	(124)
第五章 亚里士多德政体理论	(139)
第一节 对已存各理想政体的批评	(142)
第二节 政体的分类、变革与保全	(149)
第三节 最优良政体	(164)
第六章 亚里士多德与当代政治哲学	(174)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与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175)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与当代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	(180)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186)
参考文献	(193)
后 记	(207)

导 论

一 研究的问题及其意义

当代哲学可以说发生这样一种重要转向：那就是从理论哲学转向实践哲学。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就属于一种实践哲学，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如此。政治哲学也是当代哲学中最为活跃并且讨论最为热烈的领域之一，此外，当代政治哲学的意义和特征与它第一次出现在雅典时代一样明显。按照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看法，“所有政治行为都致力于保存或改变。当想要保存时，我们希望阻止趋向更坏的改变；当想要改变时，我们希望带来更好的东西。于是，所有政治行为都被某种更好或更坏的思想引导”。^① 更好或更坏的思想暗含“善”（the good）的思想，并且引导我们所有行为的善的意识带有意见的特征：虽然它没有被质疑，但是一旦经过反思之后它又被证明是可质疑的。既然“善”的意见可以被质疑，那么我们就应该达到一种不再可质疑的“善”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追求一种不再是意见而是知识的思想。^② 因此，所有政治行为本身都指向善的知识，也即善的生活（good life）或者善的社会（good society）的知识，因为善的社会是完全的政治善（po-

^①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9, No. 3, 1957, p. 343.

^② 知识不同于意见，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都对此做过区分。

litical good)。^①

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如果人类使获取善的生活和善的社会的知识成为他们的明确目标，政治哲学就诞生了。依据这个思路，政治哲学就构成哲学（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既然这里我们把政治哲学当作哲学的一个分支，那么解释政治哲学是什么就离不开解释哲学是什么。很少人意识到哲学的重要性以及它对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哲学就像树的根部或房屋的基底，是不可见的或对我们隐藏。我们可能无法谈论我们思想和行为背后的哲学，或者谈论我们思想和行为背后的真实理由或逻辑是什么，但是我们只要稍微深入思考就会发现，我们的所有思想和行为背后都有牢固的根基。哲学追求真理而不占有真理，哲学就是对我们的思想根基进行反思，这应用于一切事物，包括政治学。简言之，政治哲学就是对政治根基的反思，思考我们的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思想以获得这些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而不是意见）。

如果我们从上述谈论哲学的意义上来谈论政治哲学，那么无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可称为政治哲学的经典形式。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一起被看作在无数哲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古代思想家之一，包括政治理论。亚里士多德是在他的学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统一希腊城邦之后返回雅典，并在这个时期（公元前335—323年）写了他的政治哲学代表作《政治学》。亚里士多德的生活似乎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他的政治思想：他对生物学的兴趣在他的政治自然主义中表达出来；他辗转各地的旅行经历和不同政治制度的经历激发了他对比较政治学的兴趣以及他对民主和君主政体的同情；虽然他严厉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思想，但是他同时也从《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广泛地借鉴了柏拉图的思想；而他自己的《政治学》意图指导统治者和政治家，这反映了他经常活动于高级政治圈子。^②

^①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9, No. 3, 1957, pp. 343-368.

^② Fred Miller, "Aristotle's Political Theor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1.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对我们今天在许多西方国家政府中看到的东西的清楚表达，并且我们可能会惊奇地看到希腊诸岛上的城邦是如何与我们今天的政府所面临的许多相同问题做斗争。亚里士多德给了我们六种类型的政体定义：三种好的，三种坏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当仅一个人统治的时候，如果统治者是好的，那么就是君主制（monarchy）；如果统治者是坏的话，那么就是暴政或僭主政治（tyranny）。当少数精英统治时，如果统治者是好的，那么就是贵族政治（aristocracy）；如果统治者是坏的话，那么就是寡头政治（oligarchy）。当大多数人统治的时候，如果他们统治得好，那么就是共和政治（polity）^①；如果他们统治得不好，那么就是民主政治（democracy）（或暴民统治）（mob-rule）。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民主”这个词的意义与今天的意义有所不同。严格地说，现在我们时代的民主是朝向共和政治（polity）的一种尝试。上述六种定义都是关于政体理论（或者宪法理论），也是亚里士多德从纯粹思辨转向政治制度的实践检验，因为这些政治制度都存在于当时的希腊诸城邦当中。亚里士多德观察到城邦（或者城邦国家）的需求按照它们的财富、人口和阶级分布有极大不同。他检验了城邦和政体的种类，并给出大量建议。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城邦中最大的紧张关系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相互憎恨。因此，他认为，强大的中产阶级将使城邦保持平衡并避免腐败和压迫。那么如何做到呢？这就要求中产阶级在政府中占有一定利益或权利席位，如此一来中产阶级既不会支持那些想要推翻当权者的人，当城邦中发生严重腐败或不公正的情况时他们也不会起来反对当权者。

亚里士多德还观察到给每个人同等机会进入公职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完全排除任何群体的人获得权力也

^① 关于 polity 这个词的翻译问题，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先生的观点，polity 也指民主（意指众人为了公众利益而“治”），它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所谈的“democracy”（民主，意指众人为了自己利益而“治”）。亚里士多德认为 polity 退化后才成为 democracy。

是不明智的。政体通常是被庞大、心怀不满的集团（或派系）所改变，这些集团反抗当权者并发动革命。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要保存一种政体，城邦需要做到：节制（moderation）、教育和包容（inclusiveness）。富有的少数人和穷困的多数人的利益可以通过允许这两个集团（即富人集团和穷人集团）拥有相等量的权力来平衡，这也可以带给国家稳定和长久。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当今世界许多“民主国家”正在尝试做的事情。然而，贪婪不断导致国家的不稳定，因为贪婪使国家最顶层的少数人腐化和堕落。所有的政府都需要防御腐败并积极根除腐败，同时尽可能公平地分配财富使得穷人不再愤恨富人，因为穷人的强烈愤恨或不满是引发暴力革命的“火药库”。

历史虽然不可重复，但总有着惊人的相似。既然当代各国政府面临与古希腊城邦国家相同的问题，而亚里士多德曾经对这些政治问题有过深刻的哲学反思，那么在当代重新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毫无疑问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当代的许多学者认为，虽然亚里士多德为希腊城邦辩护，但是其《政治学》中所体现的政治哲学思想并未对希腊政治产生直接影响，因为这些思想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变得过时了。我们知道，由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帝的征服，希腊城邦永久地丧失了它们的独立性。由于类似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制度的大多数讨论也不能直接应用于现代民族国家。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辩护奴隶制、女性的附属地位以及工人阶级的选举权应被剥夺，这同样令现代人感到不快。但是，即便如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至今的政治哲学仍然有着深刻影响，因为它对政治哲学长期关心的问题有着深刻和发人深省的讨论。例如，人性在政治中的作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道德在政治中的地位，政治正义的理论，法律的统治，政体的分析与评价，理想与现实政治的相关性，政治变革与革命的原因和治理措施以及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等等。^① 因此，无

^① Fred Miller, "Aristotle's Political Theor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1.

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我们都有必要重新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

二 研究现状述评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古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为后世留下了庞大的原文著作，2000年来后世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更是进行了不计其数的研究，积累了更多的二手资料。据说柏林研究院为编订后人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诠释就耗费将近28年的时间。即使选取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思想这一方面，每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他的思想进行重新解读，并总是带着最重要的时代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主题是现代自由政治，其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的强盛导致公共政治的衰微。面对自由政治的这个问题，当代政治哲学家们总是回转到古典城邦政治，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那里寻求解决智慧。这可以区分为两种进路：一是以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波考克（J. G. A. Pocock）为代表的现代共和主义进路，也称“剑桥学派”或“共和史学派”，这个进路“以现代自由政治为基本立场，主张以城邦政治价值补偿公共精神缺失，重振个人自由”^①，此外，以查尔里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麦金泰尔（A. MacIntyre）为代表的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也可归为这一进路^②；二是以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代表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Neo-Aristotelianism）学派主张对现代自由政治立场提出

^① 转引自熊文驰《城邦共和政治与德性行动——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年，第4页。

^② “社群主义”也称“共同体主义”，它源于对罗尔斯《正义论》背后的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它认为自由主义忽略了社群意识对个人认同、政治和共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重新思考社群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社群主义并非想取代自由主义，而是通过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来修正自由主义对个人与社群关系的错误假定，重申社群对个人的重要性。社群主义已发展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之一。

某种修正，重提古典公民的德性行动，以区别于个人自由的行为方式。我们现在就从这两个方向来对国内外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研究做一梳理。

（一）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与当代实践哲学

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提到，当代哲学产生一种从理论哲学转向实践哲学的倾向。在实践哲学的意义上，当代西方哲学也重燃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研究。实践哲学源于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的区分，而政治哲学就属于一种实践哲学。因此，当代实践哲学的思潮对于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诸多政治哲学概念有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发现与重提要归功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开创的近代哲学属于一种理论哲学的进路，这种进路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那里达到顶峰。在这种理论哲学的氛围下，原本属于实践哲学的政治哲学被纳入理论哲学的框架内讨论。针对这种状况，海德格尔重提亚里士多德在理论哲学之外阐释的实践哲学，并强调我们今天非常有必要回到实践哲学的本来意义上探讨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重新解释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亚里士多德研究。

海德格尔之后的实践哲学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后）形成一股“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热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发端于德国哲学家汉斯·伽达默尔和德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以及阿伦特的《人的境况》都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在伽达默尔看来，亚里士多德使我们认识到关乎我们行动的不是理性知识或法则，而是基于实践智慧的判断，例如作为中道的美德（像伦理学上的“慷慨”、“公正”等概念）只有实践智慧的人才能掌握。所以，道德哲学不应像康德等人那样处理为形而上学的知识，而要在实践领域中探讨。

实践哲学思潮下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另一重要人物是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归为

古典政治哲学，并且他的古典阐释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①此外，施特劳斯的学生还构成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一个强大学派。施特劳斯倡导的古典解释主张立足古典著作的本身来理解它们，反对采用任何现代概念术语、脱离古典作品本身的语境来阐释古典；同时古典解释并不重点研究几个概念来理解作品，而是强调作品所包括的所有文字都是重要的，并特别强调要从作者写作目的来理解作品，也即力图还原到作者本人的意图那样理解作品。因此，施特劳斯的古典解释不再是重要概念阐释与理论架构，而是对古典作品进行深入评注。

总之，实践哲学的研究旨在恢复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本来面目。实践哲学从亚里士多德那里与理论哲学相分离，再到中世纪被理论哲学化或从属于理论哲学，最后又在海德格尔这里重新区分开来，并获得其应有的独立地位。实践哲学独立地位的重新获得意味着政治哲学与伦理学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变得突出和重要。

（二）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与现代共和主义

现代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是影响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回归亚里士多德思潮的另一主要原因。^②共和主义者将亚里士多德视作西方共和主义的最早人物，然后罗马时代的代表人物有西塞罗、塔西托和普罗塔克等人，再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弗利以及之后的弥尔顿、孟德斯鸠等人。现代共和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昆汀·斯金纳和波考克等人，也称“剑桥学派”或“共和史学派”。共和史学派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特别强调城邦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重视重现现代公民所缺失的公共精神。它有三个基本理念：一是自由观，认为自由的国家先于自由的个

^① Leo Strauss, "The Liberalism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 12, No. 3, 1959, pp. 390-439.

^② 共和主义与君主制相对立，它反对君王的世袭，强调政府职能由宪法确定；此外，它还强调平等、政治参与和公共精神，因此区别于强调个人特征的自由主义。

人而存在，离开自由的国家，自由的个人便无从说起，自由的国家是个人自由得以展现的公共空间。二是政体观，认为混合均衡政体是人类所能构建的政体中最好的政体，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各有其好处，然而问题在于它们自身皆不能持久，由此便会进入一个政体衰败的过程，由王政到僭主政体，继而到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最后是民主政体、暴民政体，再到君主制，如此循环。共和主义认为，好的政体应当能摆脱这一循环的宿命，而可能的形式就是同时兼具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者优点的混合均衡政体，也就是共和政体。三是美德观，在共和主义阵营中，除关注混合均衡政体的一方外，另一方更多地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提倡公共美德，如审慎、节制、勇气、正义等。但是，共和史学派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解读没有回到雅典时代的城邦语境中理解一些重要概念，例如“公民”，因为古典意义上的“公民”除了政治参与外还有更丰富和复杂的内容。除此之外，即使对于相同政治概念，共和主义者也做出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意义的解读。例如，“德性”一词，共和主义者提到公共的政治生活特别要有公民“德性”，但是他们把“德性”理解为一种外在义务。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德性则是行动本身的目的。尽管如此，共和主义至少突出了亚里士多德城邦共和政治及其德性行动的重要意义，对于当今政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三）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般性研究

正如我们一开始就将政治哲学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研究也就离不开他的哲学的一般性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的英译本有很多，例如沃尔德曼（A. E. Wardman）与克里德（J. L. Creed）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全集》^①；洛布

^① A. E. Wardman and J. L. Creed,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A New Selec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Renford Bambrough*,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3.

(Loeb)丛书中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有希腊文与英文对照^①；苏格蘭哲学家罗斯（W. D. Ross）主持的亚里士多德全译本^②；加纳森·巴内斯（Jonathan Barnes）主持的全译本^③。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翻译有纽曼（W. L. Newman）的译本和注释^④，巴克（E. Barker）的译本和评注^⑤；卡尔内斯·罗德（Carnes Lord）的译本^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英译本有托马斯·阿奎那拉丁文译本的英译以及阿奎那的评注^⑦，埃尔文（T. Irwin）的译本^⑧等。当然，关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还有更多成果，在此不一一列举。不过，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研究，特别是他的《政治学》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献有：大卫·凯耶特（David Keyt）等人所编的以政治学为讨论中心的论文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参考》^⑨；帕茨赫（Guenther Patzig）编的文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巴克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⑩；斯万森（J. A. Swanson）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的公与私》^⑪；穆尔干（R. G. Mulgan）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⑫；索克艾沃（S. G. Salkever）的《寻求中道：亚里

① Aristotle, Vol. 23,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② W. D. Ross, *Th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12, Oxford, 1928-1952.

③ Barnes, J.,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Vol. 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④ Newman, W. L.,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4 volum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7-1902.

⑤ E. Barker,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with an Introduction Notes and Appendixes*, 1999.

⑥ Carnes Lord, *Aristotle: The Politics,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Notes and Glossa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⑦ St. Thomas Aquinas, *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by C. I. Linzinger, O. P.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64.

⑧ Irwin, T.,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Indianapolis, 1999.

⑨ Keyt, D. and Fred D. Miller, JR., *A Companion to Aristotle's Politics*, Basil Blackwell, Inco, 1991.

⑩ E. Barker,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Plato and Aristotl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59.

⑪ Judith A. Swanso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in Aristotle's Political Philosoph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⑫ R. G. Mulgan, *Aristotle's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士多德政治哲学中的理论与实践》^①；尼可拉斯（M. P. Nichols）的《公民与政治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研究》^②；雅克（B. Yack）的《政治动物问题：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的共同体、正义与冲突》^③；理查德·克劳特（Richard Kraut）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④；弗雷德·米勒（F. D. Miller）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自然、正义与权利》^⑤；迈克尔·戴维斯（Michael Davis）的《哲学的政治学》^⑥等。

国内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有以下学者：首先是吴恩裕，他早年留学英国，专门研究政治哲学，著有《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论集》，是早期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重要人物^⑦，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思想做了一般性的介绍。其次，严群、向达等学者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著作进行了翻译和研究，例如严群的著作《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从伦理道德的维度探讨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体理论与中庸思想；向达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进行了翻译，题名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最后，国内哲学界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专家还有陈康及其学生苗力田、汪子嵩等人。陈康先生著有论文集《陈康：论希腊哲学》，其研究重点主要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方面，对政治哲学的研究相对要弱一些；苗力田主持完成《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

① S. G. Salkever, *Finding the Mea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istotel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M. P. Nichols, *Citizens and Statesmen: A Study of Aristotle's Politic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2.

③ Bernard Yack, *the Problems of a Political Animals: Community, Justice and Conflict in Aristotelian Politic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④ R. Kraut, *Aristotle: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⑤ F. D. Miller, JR, *Nature, Justice and Rights in Aristotle's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以及书评 Randall R. Curren, *Reviews, Reason Papers*, pp. 144-153.

⑥ M. Davis, *The Politics of Philosoph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6.

⑦ 吴恩裕 193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教授获博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等多所学校担任政治学教授，并且他还是著名红学家。政治学方面的著作有《西洋政治思想史》、《政治学问题研究》、《古希腊政治思想史》等。

译,进一步推动了关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研究;汪子嵩则编有《希腊哲学史》,其中第三卷专论亚里士多德,对其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介绍。此外,还有吴寿彭先生所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廖申白翻译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等著作。近年来,围绕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研究的代表性论著还有复旦大学洪涛先生的《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在“亚里士多德:希腊政治哲学的终结”一章中从语言与政治关系入手探讨了亚里士多德所展示的政治传统。综观国内学者的研究,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多于论著,一般性研究多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对亚里士多德政治自然主义思想的研究更是鲜有涉及,研究重点比较分散,思想与学术上还构不成体系,没有达到一个相对完备的阶段。

三 研究目的、方法与难点

从已有的关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研究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学者特别是当代西方学者希望从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那里获取个人自由与公共精神之间的一种恰当张力。当代政治哲学有两个主流:现代自由政治与现代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政治过于强调个人的特征,使得公共精神衰退;而共和主义过分强调公共精神,使得个人割让更多自由给国家。因此,重温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动机就是寻找如何在保持一定限度的个人自由的前提下保证有效的公共精神的途径。这就需要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解读,而不是为了当代政治主题去吸收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某一方面为我所用。但是,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仍然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或者立足于当代政治语境去思考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使得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被深深打上当代烙印,这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亚里士多德本来的思想面目;或者像施特劳斯那样完全摒弃当代政治语境的影响,力图真实还原